

崇川往事

“拉郎配”的明代石椁

◎赵鹏

石椁万斤凿运繁,伤筋折骨庶民冤。行人欲学明朝史,这是斑斑血泪痕。

汉寝唐陵铁样坚,早经狼藉见青天。可怜石椁埋黄土,强伴僵尸四百年。

上录两首绝句,是乡前辈陈知津先生写的《石椁》诗。所谓椁,指的是棺材外面的套棺,石椁即用石材制成的外棺。陈先生所咏者,乃是露放于南通博物苑南馆外的那具明代石椁。其诗写于石椁刚被征集到苑的1976年,当时“文革”尚未结束,诗中还带着比较明显的时代烙印。

自从这具石椁被征集到苑,就一直露放在南馆外。或许是习焉而不察,我在苑供职这么多年,竟也没有想对它作一些了解。以往虽也听到一些知情者说及,总没有好好地记上心头,只有个印象,这个石椁的墓主人是明代通州人凌楷。凌楷是正德三年的进士,曾官至南户部郎中,死的时候才三十七岁,可谓英年早逝。

数月以前,偶逢苑里的志愿者问及此椁主人,我便告知是凌楷。为了保险,还特地向知情的老友作了核实,然后回复道:“凌楷墓在南通城西任港路(‘文革’时称大庆路),20世纪50年代平整土地时被挖毁。挖墓后曾通知凌氏后代到场,据闻尸体未腐,但已被民工抛到附近小沟了。石椁后被附近某工厂用作化工(电镀?)液体水槽。20世纪70年代博物苑恢复业务后征集来苑,一直陈列在南馆旁边。”

以为事情到此已说清楚,不料最近看到苑存的原始记录,才知这里面还有一些误会。首先,凌楷墓虽然确实在大庆路,当时属向阳公社战胜大队,但其被挖是1966年“破四旧”时,墓室、墓道设施在当时都被毁,仅存的一合墓志是1974被博物苑征集到的。其次,石椁虽然出土于凌氏家族墓葬群,但主人却是一个名叫季桂卿的女性。凌楷墓本也在这个墓区,但因系规格高的“隘山坟”,封土高、目标大,所以早就被挖,其他墓则是1973年2月被挖的,包括季桂卿的墓。

1973年10月,南通博物苑(当

时称南通博物馆)举办出土文物展览,就曾展出季桂卿墓里的出土物,当时的展出说明对墓的情况说得比较仔细,抄于此:“1973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,我馆在南通市郊区向阳公社战胜大队第八生产队清理了明墓一座。该墓共十四个墓室,其中有一个墓室,尸体尚未完全腐烂,随身衣着也比较完好。死者是女性,名叫季桂卿,死于明嘉靖十六年(公元1537年)。该墓棺木是用六块整板拼成,棺外有木椁,木椁外面还有一具用整石凿成的石椁,密封程度很好。据调查,墓主姓凌,是明代的一户官僚地主家族。这里陈列的,是该墓中出土的部分文物。这些文物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,被地主阶级埋藏了四百多年,现在重见天日,回到了人民手里。”

举办出土文物展览时,那具石椁尚未征集到苑,到苑则是1976年2月23日,经手人为姚锸先生,他在当时填写的新收文物记录单上有说明云:“该椁是1973年季桂卿墓出

土,是季的棺材的外椁,由花岗石凿空而成。今天由我馆运回来,陈列于南馆外面。”另外还注明这件石椁“缺盖”。同时征集到苑的还有一块石椁盖,其记录单说明云:“出土文物,由本馆收集。据当地贫下中农反映,该石盖是大跃进(1958年)兴修水利迁移墓葬时所掘,墓主姓白。现放于季桂卿石椁上,暂且充当椁盖,因椁盖在出土时已损坏。”这一石椁盖出土于与凌姓家族墓群相邻的生产队,一个是战胜八队,另一个是战胜一队。

看到这些记录才恍然,我们所见的石椁,椁身和盖原来并不是原配,难怪盖的尺寸要大于身。这大头小身的现象以往也感觉到,只是没有进一步去深想。照当年记录的意思,把白姓墓的椁盖放在季桂卿墓的石椁上,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。想不到这一配就配到现在,甚至还得长期这样保持下去,我现在不把懂得的说明一下,估计对这石椁的情况也会一直含糊下去的。

民初南通县的司法官

◎管劲丞

沙,但因为灶民暴动和他有关,设在金沙的审判厅被派的却是余西场大使,并且划定余西、西亭、三乐乡均归管理。1912年9月,总司令以下都取消,司法方面的审检两厅成立,这些因人而设的限时畸形机构,随而相继结束。

按:张有琛任司法长,《南通县图志》列在《职官表·司法职官表二》,所标时间为清宣统三年九月,即公元1911年11月,已在通州宣布独立之后,而《图志》沿用清廷正朔,并附注以通州知州改设字样,好像改设者仍然是清吏。这时,司法长张有琛已在他原任知州衙门内成立司法厅,发布通

告,略谓“通州业已光复,所有司法事务,命盗词讼各案,归司法厅办理,另订新章收纳讼费,旧日书差需索之弊,一律扫除净尽。嗣后遇有控诉事件,仰即径赴本厅具呈”云云。又按:张有琛得被推司法长,并非由于他有法律知识或审谳经验,主要是把他安插下来。为此,把原来驻通州的发审委员孟梅同时留下来,给予一个总司令处参议的名义,安排在司法厅,作为实际的司法长。《南通县图志·职官表》,司法官列有孟梅,职别是司法参议,其实当时司法厅和民政、军政、财政三处编制一样,没有什么参议名目,只有总司令处有此设置。

海陵旧话

“一柱楼诗案”吓死孙乔年

◎徐继康

“一柱楼诗案”是清代著名的文字狱之一,其惨痛之烈、查禁之严、追缴之密,在乾隆年间130余起的文字狱中堪称一时之最。今存史料多为当年皇帝的圣谕与查办大臣的奏折,而有关于案发时耕茶徐家的境况以及时人的心态,一直都无从查考。近人张伯驹在《春游琐谈》里《记明诗赏奇》一文中,记载了一则与此案相关的珍贵史料。

1938年,西北大学教授陈直为避日军之祸,寓于东台县溱潼镇孙家庄,结识了孙南滨先生。孙家秘藏有两部奇书:《明诗赏奇》和《南国集》。《明诗赏奇》乃明末太仆寺属官陈皇士所编,其内容选录明末遗老诗篇的两千余首,或记清兵之屠杀,或记孤城之抗守,或写遗臣哀咽之音,如黄道周、冒起宗、夏完淳等人的诗作均选不少。此书四册,书面原皆撕毁,为清顺治初年刊刻本,这种“悖逆”之书,其珍稀程度不言而喻。至于《南国集》,是明中期高邮张世延的诗集,文笔生辣,亦十分稀见。说及两书,颇有来源,乃是孙南滨五世祖孙乔年的秘藏。孙乔年在嘉庆《东台县志》中有小传:

孙乔年,字心古,古孙家庄人。文体华赡,词赋亦清丽可喜。由进士官苏州府教授,训迪多士,多所成就,巡抚闵公鶚元特器重之。后卒于官。

传中仅记述他“卒于官”,并未说明原因与时间,其实孙乔年之死与“一柱楼诗案”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原来,他与徐述夔的弟子徐首发最为友善,徐首发正是该案的要犯之一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秋,“一柱楼诗案”事发前夕,山雨欲来风满楼,徐首发夜雇一叶小舟载书一箱寄于东台孙家。后来,徐首发在北京被斩首,故书籍未取回。随着清廷对此案查处力度的加大,在全国掀起腥风血雨,唯恐被牵连的孙乔年在苏州“映雪堂”服毒(一说吞金)自杀,死前将自己的诗文全部焚毁。孙乔年是乾隆三十三年举人、乾隆四十六年的进士,虽然小传中说他“训迪多士,多所成就”,但根据当时局势,应该是到苏州府任职后不久即自我了结于恐惧之中。在“避席畏闻文字狱”的年代,这种结局并不令人意外。可惜的是,这箱让许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珍贵书籍,却被其子孙或焚毁或遗失,存留下来的仅此两部。

陈直对此也是感慨不已:“此等清代之禁书,未知天壤间有第二本否?”陈直深知两书的价值,想借来抄录副本,而孙南滨坚决不肯。直到20余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初,陈直与孙南滨通信时再提此事,才知《明诗赏奇》被其亲戚借去,已杳然不知踪迹。而那本《南国集》被售于泰县文化馆,而今又过60年,不知是否还保存于世?

旧文新刊

辛亥革命,通州宣布独立,改称南通县,设有总司令、军政长、民政长、财政长及司法长。司法长张有琛,原系通州知州。通州的所谓革命,实际不过权豪势要的地方巨绅和平接收了满清官吏的军权政权,事前曾双方妥协,总兵拿着钱走开,游击变为军政长,同例把司法长安插了旧知州,他仍旧住在知州衙门里,而衙门倒被称为司法厅。同时驻在二甲坝的州同,便被委为司法分厅。石港、金沙各设初级审判厅,以安插旧石港场大使方燕毅和余西场大使宫桂,则是例外的援例。金沙场大使刘翰章,照例本可以在金